

营山文史资料

第九辑

政协营山县委
文史资料研究组选编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

目 录

- 1、营山县私立晋德中学简介..... (1)
- 2、解放前夕营山县城区教师的歌咏演剧活动..... (7)
- 3 抗日战争前期的营山“晨钟剧团”..... (10)
- 4、邓托夫在营中二三事..... (12)
- 5、我所知道的营山县长邓虎章..... (15)
- 6、我解放前经营山货业的经历..... (16)
- 7、一九三三年红军到易家沟的前前后后..... (18)
- 8、一九四三年田赋税款被劫记..... (21)

营山县私立晋德中学简介

营山县私立晋德中学，是解放前营山县城唯一的私立中学。它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秋季开办，到一九四九年底结束，历时近九年，共毕业学生一千余人，为社会，为国家培养了人才，对提高文化水平，促进地方发展，起了一定作用。晋德中学在我县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我曾在晋中两度短期任教，现仅就我亲见，亲闻和搜集所得部分资料，对晋中的情况作简要介绍。谬误疏漏，在所难免，请知情人士纠正补充。

学 校 筹 建 经 过 概 况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前后，营山各乡镇已有中心小学二十余所，每年高小毕业生增加到一千多人。而全县仅有县立初级中学一所，每年秋季招生，仅招收男生二至三班，学生一百五、六十人，女生一个班，学生五十人左右。中学招生名额太少，远远不能满足众多高小毕业学生的升学要求，失学青年越来越多，矛盾日益严重。广大父兄都希望再办一所中学，以便让较多的高小毕业生能读上中学。这个民众办学的要求日趋强烈，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县教育界老前辈李子麟先生，地方士绅陈筱韩、廖次达等人，和部分老教师关心桑梓教育事业，出面倡议创办一所私立中学，以解救青年失学之苦。于是，一个群众集资兴学之议逐渐变成了行动。

那时，由一班少壮派人士组成的“十人团”，正力图从老一代士绅手中夺取权力，控制地方。他们已渗入了党、政、军、财粮等各部门，有的已经当上官，掌了权，成了营山的新贵。但众人瞩目的堂堂最高学府营山县立初级中学的校长宝座，他们虽然觊觎已久，垂涎三尺，却未能抢夺到手。“十人团”主要成员唐绍虞早已是营中校国文教员，他古文讲得好，又会写文章，颇有名气，以营山教育界的头面人物，担任县参议会副议长。唐绍虞本人早就渴望当上营中校长，“十人团”也企图抬他出来占领营中校这块地盘，进而左右营山教育界。他们曾通过多种关系，到省上打点营谋，得到的回答却是，政府早有明令规

定，县立以上中学校长必须大学本科毕业才有资格担任。唐和当时“十人团”衋衋诸公均无大学毕业学历，只好望洋兴叹。正在他们失望之际，县里民众集资兴学的活动开始了，这正符合他们另觅蹊径的打算，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十人团”也闹闹嚷嚷，力表赞助；唐绍虞以营山教育界名流身分，亲自出马投入了倡议筹备活动；并想借此依附营山显贵邓锡侯，以达到他向上爬的目的。至此，学校筹建工作得以加快进行。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由李子麟、唐绍虞联名发起，邀请在县部分绅耆和实力人物陈筱韩、王鲁门、唐曼卿、廖次达、李少雄、冷和薰、李石樵、张德锐等人，召开了首次会议，决定集资兴办私立中学一所，成立建校筹备委员会，公推李子麟、唐绍虞为正副主任，并立即正式开展筹备工作。

当时要在县里开办私立中学，必须得到省上有力人士的大力支持，才能获得省教育厅批准立案与经济支援。于是筹委会派廖次达到成都谒见营山同乡、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字晋康），并与李铁樵、寇梦波、张纯祖（又名德馨）、刘吟舟等旅省同乡联系，请求他们支持赞助，为桑梓捐资兴学，造福子孙。邓锡侯慨然允诺，表示全力支持，捐田产五百挑，作为学校基金，张纯祖捐赠银元二千元，其他人士也各有捐赠。县城积谷会捐赠田产四百余挑；复兴乡李伯骞捐田产一百余挑，变卖得法币一千五百元，福康字号（经理廖次达）捐银元一千元；其他各界人士捐款百元至数百元不等。建校基金初备，筹备工作更得以顺利进行。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日，筹委会在营山县城约请有关人士或其代表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邓锡侯、刘景淑、李铁樵、寇梦波、张纯祖、刘吟舟、郭国燕、陈筱韩、李子麟、唐曼卿、王鲁门、廖次达、吴佑辅、唐绍虞、李少雄、冷和薰、李石樵、唐季高、张宝山、李伯骞、任禹舫等二十一人为董事，公推邓锡侯为董事长，张纯祖、陈筱韩为副董事长。董事会正式成立。董事会决定创建中学一所，定名为营山县私立景阳中学。是借营山八景之一的“景阳晨钟”的“景阳”二字来命名的。董事会还决定了筹建工作和各部分的负责人，如秘书由唐绍虞负责，财务由廖次达负责等。

接着，董事会具文呈报营山县政府，请拨公产庙宇作为校舍。经县长张鸿士批准，划拨文庙、文昌宫全部为校舍。董事会随即雇工改建，经过三个月紧张施工，校舍粗具规模，教室、礼堂、寝室、厨房、厕所、运动场俱备，桌凳、黑板、床、炊具等设备也赶制齐全。

继又向四川省教育厅请求立案。教育厅长郭有守以邓锡侯主任在家乡捐资兴学，表示支持，同意开办，并大大缩短了考察时间。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正式批准立案，转报

教育部备案。

至此，筹建工作基本结束。董事会敦聘唐绍虞为营山私立景阳中学校长，负责主持学校工作。并决定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秋季招生开学。

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董事会决定学校改名为营山县私立晋德中学。

晋德中学的特色

一、严格的教学制度

开学前，唐绍虞校长聘请罗信让为教务主任，王能新为训育主任（旋改由蒲代昌担任），龙显华为体育主任，李楷为童子军训练教官兼事务主任。专任教师有邱研醒、邱栖迟、陈澍、王能新、郑书带等长期从事中、小学教学，富有经验的老教师。

开办第一班为中一班，共招收男新生一百二十多人（包括备取生），编成甲、乙、丙三组，分班教学。

学校初创，董事会要求一定要办出成绩，力争获得教育厅早日批准立案与社会的称赞和支持。因此，学校一开办就特别重视教学工作，力图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采取了不少有效措施。

学校按照教育部规定开设课程计有：国文、英语、数学（分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四科教学），公民、植物、动物、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音乐、图画、劳作、体育、童军训练等十几门课程。分三学年六学期学完，使学生由浅到深，逐步掌握较为全面的文化科学知识。

学校要求教师必须按课程表上课，严格管教学生；教学要循循善诱，课内要留有一定时间，让学生自己思考，消化所学知识；课后要布置作业，作业要批改；国文和英语课文要背诵，英语还要学习会话。绝大多数教师都能认真讲课，认真检查学生学习情况。有的教师习惯于随带竹板子上课，学生坐不正，不专心，打瞌睡，甚至背不好课文，答不上问题，都会挨板子，其中蒲代昌等老师更经常在上课时打学生。在教师的严格要求，特别是竹板子威胁下，学生无论自觉不自觉，都不能不规规矩矩，认真学习，大多数学生的成绩都是比较好的。

学校执行严格的考试，升留级和毕业制度。

课堂提问，作业评改和实验，都要记分，作为平时成绩。期中和期末举行统一的考

试，学生习惯称之为“小考”和“大考”。考试中有舞弊犯规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扣分、记过处分。学期结束，根据平时成绩和小考、大考成绩评算出学期成绩。学年结束，根据上下两期的学期成绩评算出学年成绩。学年结束，中、英、数三门主科有两科不及格者，留级；一门主科加上其他课程两科不及格者，留级。有不及格学科而未达留级标准者，下学年开学后补考。学期和学年成绩均要造册报省教育厅备案。学生三年学习期满，各科成绩及格，准予毕业，学校发给毕业证明书，参加教育厅举行的会考，成绩及格者，由省教育厅发给毕业证书。后会考停止，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

学校初创，教学设备简陋，唐绍虞校长曾专程到成都请求支援。省教育厅因邓锡侯的关系，特别表示关照，批准拨给理化仪器和生物标本各一套。学校领回后，开设了实验室，理化教学能作简单演示实验。另外，购得图书千余册及若干教学图表。张纯祖也捐赠了《中学生文库》一千册。学校开辟了图书馆、阅览室，每周定时开放借阅，扩大了知识范围。

晋德中学教务方面的规章制度和措施，主要是教务主任罗信让负责筹划拟定的。这些办法一直基本沿用不变，直到晋中结束。

由于晋德中学重视教学工作，制度严，卡得紧，平时学生学习努力、认真，大多数学生都学得较好，成绩优良。参加了省教育厅举办的会考的班级，都考出了较好成绩，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二、粗暴的军训管理

晋德中学对学生实行童子军军训管理。对学生既注意思想控制，又严格约束言行，还在校内建立乡镇保甲制度，处处管卡，层层节制。

据《晋中训育实施情形》记载：学校“每周集会专题讲解国父遗教与总裁言行及共通校训与青年守则等，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这种专题讲解，在每周星期一纪念周举行，主要由校长或邀请党政官员，社会名流主讲，这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每天除晨早和薄暮举行升降旗仪式时，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外，下晚自习后，照例举行晚点名，全校学生整队集合，清查人数，由训育主任或童军教官，值周教师训话，宣讲共通校训和青年守则，并结合当天实际，对一些违纪学生进行处罚。

学校制订了要求严格，内容细致，条文繁多的校规，要求全体学生绝对遵守。凡有触犯者，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小过、大过的处分。学生在三学年中，所受处分累积

计算，三次警告为一小过，三次小过为一大过，积满三大过者，开除学籍。所有大小处分均由学校出牌告，通告全校，以警效尤。此外，还有在学生胸前挂“朽木牌”（取“朽木不可雕也”之义）的惩罚，挂上这种牌子的学生，要找到犯同类过失的“替身”才能取掉。还设有“禁闭室”，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屋，门上一个小方孔，室内一架平床，一个尿桶。犯规被关学生自带被盖，吃饭由小孔递入，大小便均在屋内，跟犯人坐牢相似。体罚学生则更为普遍，办公室内桌边墙角到处都有三尺长二指宽的竹板子，学生挨手板、挨屁股的，几乎天天都有。我曾多次看到蒲代吕、李楷等人酒醉回校后，无故责打学生，动辄就是打屁股。

学校开办初规定学生一律住校食宿，以后也有通食的。平时不准出校门。星期天上午组织各种活动，无特殊事情不得请假。下午放学，学生必须在七点前回校，迟到或请假逾限者处分。每天早晨起床后，整队沿街或在操场上跑步，然后才上早自习。下晚自习后，例行晚点名。还不定期举行夜间紧急集合。往往在半夜里，突然吹紧急集合号紧急集合，学生来迟了的，着装不整齐的，都要挨打受训。有时清点人数后就下令学生跑步，往往一跑不停，时间长达半小时以上，学生连吭也不敢吭一声。

校长唐绍虞为了按照他们的理想培育学生，同时弥补教师对学生管理之不足，还把国民党政府统治民众那一套乡镇保甲制度搬进学校。在各班建立乡镇保甲制度，规定“以每班为一镇，设指导员，由级任充任。按人数多少，编组保甲，以便层层节制。”（摘自《晋德中学学校市镇组织纲要》）每镇设镇长，中一班镇长有王顺通、徐沁等。镇长下设民政、教育、财政、建设四股长，协助镇长管理全镇市民及各种事务。“实行保甲制度，每甲六至十人，以教室座号划分，三甲至六甲为一保，设保长。”（摘自《晋德中学学校市镇组织纲要》）实行保甲连坐法，规定：“本甲市民应互相规过劝善，互相监督约束，如有违犯重大过失，足以影响全镇市民或本区秩序或触犯某项禁令者，除犯过者应受严格处分外，本甲市民均须连带受相应之处分。”（摘自《晋德中学学校市镇组织纲要》）在这种严密的组织形式里，每个学生不仅要受学校校长、主任、教官、级任的严格管理，乡镇保甲长的层层节制，还要受到每个同学彼此的互相监督约束。晋德中学这样严格甚至极为粗暴地管理学生，究竟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呢？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为增进学生社会经验与政治能力”（摘自《晋德中学学校市镇组织纲要第二条宗旨^上》），其最终目的，是要每个学生都象他们心目中的标准学生镇长、保长那样。”做一个遵守总理遗教，服膺总裁训示的忠实信徒。”（摘自学校拟订的《晋中保长愿词》）。

晋中这套粗暴的管理制度，在唐绍虞当校长的前段时间，坚持执行，后来就逐渐废弛弃置了，但体罚学生依然较为普遍。到一九四九年下期，由于大量青年大学生间其担任了晋中的教师，才认真地改变了原来的粗暴的军训管理，停止体罚，对学生以说服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实行了较为合理的管理。

三、活跃的体育运动和课外活动

晋中的体育运动是活跃的。体育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教师教学认真，田径、球类、器械、体操并重。体育课内着重教技术，每天下午课外活动，学生按体育处安排进行活动锻炼。学校和每班都组织有篮球队、排球队，经常举行班级间友谊比赛。罗信让任校长时，教师也组织了“铎声”球队，印制了背心。学校和教师球队常与营中或社会上的球队进行比赛。每年学校还举办校内运动会，进行球类和田径比赛。

每年春秋两季，学校还组织学生短途旅行。

童子军团部还组织学生“露营”，到野外搭帐篷，露宿、搞野炊、爬山、营火、偷营等活动。

晋中也很注意开展课外活动。每期开学后，教务处对大的课外活动作出项目及时间安排。数学竞赛、作文竞赛、英语竞赛，一般分年级进行，优胜者给奖；开讲演会，由学生联系社会实际自定题目，自写讲稿，在全校大会上公开演说。由教师和学生代表担任评判员进行评比，优秀的个人或集体，由学校给予记功或物质奖励。学校还利用国定假日或寒暑假，组织宣传队向社会宣传。宣传队由学校挑选口齿清楚，善于表演的学生组成。宣传队员要先练熟学校发给的宣传材料内容，并排好节目，然后上街向民众宣传时事和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法令，并表演小型话剧，金钱板、唱歌等节目。

四、设立奖学金制度

学校董事会为鼓励学生品学兼优，不断上进，成为社会中坚，国家栋梁，特地设立了奖学金制度。学校规定，凡品行端正，学业成绩优良的学生，由学校评议批准，可获得奖学金。奖学金有三种：晋康奖学金，每期发给三十名；国燕奖学金，每期发给二十名；德馨奖学金每期发给十名。这三种奖学金金额不等，最低的可解决学费，最高的德馨奖学金除缴学费外，还可剩下一些零花钱。品学特别优异的学生可同时获得两种奖学金。

晋德中学从创办到结束，共有三任校长。首任校长唐绍虞（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

年)秋到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冬);二任校长罗信让(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春到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冬);三任校长蒲代昌(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春到营山解散。但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在创办伊始,即由董事会和唐绍虞所确定。唐绍虞在《晋德中学创建记》中说:“邑人邓晋康先生捐资兴学,创办营山县私立晋德中学,爰所以解救青年失学,发扬民族固有文化,造就社会中坚人材……。”《晋德中学学校市镇组织纲要》第二条宗旨中,更明白指出是“为增进学生社会经验与政治能力……。”企图使每个学生都“做一个遵守总理遗教,服膺总裁训示的忠实信徒”。但是,学生的成长决不是学校教育可以完全决定的,还要受社会、家庭以及多方面的影响。在那时,抗日救国思想的熏陶,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鼓舞,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感染,特别是解放前夕校内中共地下党员教师和进步教师的启发教育,都使学生对国民党统治腐朽黑暗有所察觉,有所认识,思想有不同程度的觉醒。即使在唐绍虞当校长时期,绝大多数学生也没有完全按照唐绍虞们的规范,成为他们理想中的“忠实信徒”,而是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埋头读书,掌握了一定文化科学知识,为继续成长奠定了基础。现在,当年晋中毕业的学生散布在全县、全国,不少人成了干部、职工,把自己的知识和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

营山县私立晋德中学是有其特色的,也是有所贡献的,在营山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陈永康 撰写

编者按: 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七日四川省政府第3875号令开:“遵照委员长‘民权行使必须从实际中加以训练’的原则”,规定在中小学实行乡镇保甲制度。但全川绝大多数学校均未执行,唯晋中忠实地执行了。

解放前夕营山县城区教师的 歌咏演剧活动

一九四六年冬,我从成都回营山途中风闻:“营山有共产党闹事。”回营山后,才了解到事件的真象是官绅勾结,支使暴徒殴打索薪清账的教师,镇压营山人民的正义斗争。四七年上期我去城守小学教书,眼见青年教师情绪低沉,好些人成天浑浑噩噩,无所

事事。

一天晚上，几个朋友正坐在“华丰”店堂（今县政府对门）里谈天，来了一个短装青年，他一来就和大家亲切握手，龙显贵即给我介绍：“这位是李煜生”。他说话很少，别人问他：“何时回的营山？”他说：“今天。”“从那里回来？”“江安剧校”（当时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中原解放区回来的。

此后李煜生也入时随流地穿起了长衫，和大家一起坐茶馆或散步，更喜欢和人闲谈文学、音乐、戏剧，却绝少听到他谈政治。大约是他回家两个月后，在“崇仁”（今人民餐厅处）茶馆里，他拿一本邵荃麟在香港主编的文艺刊物给我看，那上面的文章短小精悍，很富战斗性，还有孙犁写的《白洋淀边》，在坐的都爱不释手，商量合资去订一份。这时东升的喻维良、小桥的周清文常进城来，李就提议我们晚上找个清静地方去练练歌。大家非常支持，从此好多人课余之后也不再去茶馆消磨，而是按约定时间，到城守小学（今电影院处）围着昏暗的油灯或坐或立唱起歌来。

这之前，营山流行的多是悲凉颓废靡靡之音。唱歌时李煜生总是到得最早，事前还特意把歌抄好带来。不几天营山城就流行起《掏洋芋》、《朱大嫂送鸡蛋》、《茶馆小调》和《古怪歌》来。这都是讽刺国民党黑暗政治的，特别是《古怪歌》最为传唱者所喜爱，短时间内街头巷尾到处可以听到“往年古怪少哟，今年古怪多……半夜三更里哟，老虎闯进了门……”的歌声。短短几天唱得反动当局惶惶失措”。

唱歌活动大约持续了二十多天，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时不仅在城守小学唱，一批青年在寇家花园（今机关幼儿园处）还举行舞会。记得是莫孟初结婚，当夜有人倡议跳交际舞，李煜生、陈淑嫒等人也乘兴扭起了秧歌。一时在场的人都跟着“3·2 3 2 123 2”以手拍节，口哼乐曲地应和起来。以后每次举行交际舞会，总要扭扭秧歌唱唱进步歌曲。这些活动自然引起了特务方仲篪、李宗辉等人的注意。但他们拿不着把柄，也奈何不得。

是年秋李煜生受聘晋德中学。开学前的几天他提议约几个朋友来排剧，大家立刻赞成。没有合适的剧本，李说：我来写，写好大家研究。于是他连用了三个下午时间，把剧本写出来。内容是：松花江边一对老夫妻，冒着生命危险，忍受日本兵的残酷折磨，掩护负伤掉队的义勇军战士，高潮时，有歌有舞，很是动人。大家定名为《松花江上》，记得参加演出的人有李煜生、李道镛、王定华、龙显贵、张志修、罗怀杰，李煜生任导演。台词用北京话，布景用幕布象征性代替，服装由饰演者自己解决，力求做到不费事，不花钱。经过了十多天的排练，周清文、喻维良等人又加排了些演奏舞蹈节目。开学后，即以

学校名义对外演出。此剧先后在城守小学、晋中、女中、民教馆连演四场，居然场场人满，县城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在民教馆演出时，县长朱彦林和各科室人员都临场观剧，并大加称道。解放后才知道，这个剧是李煜生把解放区老作家周而复的秧歌剧《牛永贵挂彩》稍作变动不露形迹地搬上了当时营山的戏剧舞台。

这一活动大大地激发了各校师生演剧热情，此后晋中、女中都常搞歌咏和话剧演出。单是女中学生，就曾排演过《咖啡店之夜》《阎海文》《棠棣之花》片段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中全体教职员在四八年上半年演出的曹禺的四幕话剧《雷雨》。

四八年上期，晋中教师中的顽固派，不满校长罗信让，借口校长重用了有共产党嫌疑的外籍教师李祺维，密谋向县上告发，把李煜生也牵连在内，同时“岳武举义”的消息更不时传到营山。这时李煜生也受组织命令离开了学校去农村准备全县的“中秋起义”搞武装斗争。当时还留在女中的陈淑嫔、胡崇德就积极鼓动全体教职员排演《雷雨》，首先得到了老教师、教导主任秦朴的支持，他还不辞辛劳地为大家刻写剧本。校长唐绍珍也被这股演剧风所感染，并带头参加演出。于是会计龙显贵就来找我去作导演（因我对话剧较喜爱，演《松花江上》的黑铁爹又曾获得大家好评，加之这时我在民教馆工作，搞文艺活动又是我的业务职责），也就一口答应了。

参加演出的人有：唐绍珍、陈淑嫔、龙明德、刘兰芬、刘淑筠、苟凤珍、胡崇德、刘梦桃等。排练时由于陈淑嫔和胡崇德坚持要说北京话，因此学念台词及分幕排练就花了一个半月。然而大家却情绪饱满，每天都能坚持二、三小时。《雷雨》终于在一个夏夜与学生见面了。

虽然不是对外演出，可消息却不胫而走，这天晚上女中礼堂外草坪上站满了前来观剧的人，唐绍珍还请来了好些社会名流和一些太太。演出中观众秩序井然，在台上的陈淑嫔和胡崇德还真动了感情，引得观众中好些人唏嘘不止。可是演到剧情高潮，第四幕的四凤、周冲相继触电时，从城墙外（旧女中礼堂外空场即傍新北门城墙。今邮电局侧门处）连续冲进来好几块石头，还有人在外高声漫骂。当然这就不是一般地捣乱，而是蓄谋破坏了。演员们都不愿再演下去，只好宣布停演。可是观众却不愿离去，有的甚至要冲上城墙去看是什么人在捣鬼。第二天在“群进”（当时营山士绅常聚会的地方，今公安局斜对门处）茶馆里却放出风来“女中竟演啥子《雷雨》总是又有人在搞异党活动嘛！”可见反动派对这个剧是何等恐惧。

此后李道镛还提议邀约集男女青年教师排演郭沫若的《孔雀胆》。但不久漆玉林

（特务）来营山，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王敏被捕，白色恐怖笼罩全县。同时，要演此剧，人力物力都不够，也就作罢了。

城里青年教师演剧也影响了附近乡镇。四九年春节，中正乡（今丰产乡）以王鲁门为首的乡绅集团，为了粉饰太平，向群众筹款在春节中大庆三天，命该乡青年黄乃及等进城来再三约请教师们去演出。大家也利用机会去进行宣传，十几个教师一到中正乡，乡绅们殷勤接待，轮番宴请，等到演出时，剧目却是陈白尘的《禁止小便》（讽刺国民党官场中的裙带风和吏员的不学无术）和周彦的《龙王庙》（借龙王要供，讽刺官府的层层剥削）这两个剧都表面热闹，却寓讽刺于热闹中。群众看了都拍手称快，乡绅们一个个却哭笑不得。

城区青年教师的唱歌演剧等活动，意义绝不仅止于单纯地唱唱跳跳，自得其乐，实际上是党给予了极大支持和正确领导。李煜生在这一系列活动中不仅巧妙地以文艺形式播下了革命火种，而且团结了营山进步的知识青年同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也为后来迎接解放，建立营山解委会文教组文工队培养了宣传骨干。

王定华 撰 写 文史组略有删节

抗日战争前期的营山“晨钟剧团”

为了抗日救亡，并向营山人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营山一批小学教师，小公务员和营中部份城区学生，于一九三八年冬天组织了一个“晨钟剧团”，在营山城区和农村进行话剧演出，时间约一个多月之久，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

一、筹备与组织情况

有一个叫罗正鹄（东升人）的小学美术教师，此人又在民众教育馆兼点职务。民教馆与晋康图书馆在一处，他就住在这里。平常有不少小学教师和营中学生，在罗正鹄住处聊天。大家都认为，时值抗战时期，救亡图存应作为青年的己任，对抗日救国做点宣传工作，这是完全必须的。在众多的来客中，有一位县府科员，眉山~~人~~姓刘（忘了名字）的

人，他参加过专业剧团，擅长话剧业务。并会说官话（现在普通话），他建议在营山组织一个业余话剧团，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罗正鹄和其他小学教师的响应，由罗出面负责筹备，我记得赞助和参加了这个剧团的教师有：唐孟洙、杨鹤舫、唐回陶、李晓村、郑治平、乐元清、龙显华、唐绍修、刘鉴古……等；学生有：何礼学、文先经、饶元璋、何泽春、龙显贵、李萃友、王远章、杨春薇……等。在筹备过程中，由唐回陶起名为“晨钟剧团”，寓意是“晨钟暮鼓，唤醒痴迷”。

“晨钟剧团”由罗正鹄任团长，唐孟洙任财务，刘××任导演。剧团的成员，既是演员，又是工作人员，为了演出，不分彼此。

剧团的经费是由剧团中有薪资收入者捐赠的，也向社会人士募捐一部份，学生免缴。剧团比较顺利地建立起来了。

那时的物价还算便宜，剧团只制作必要的一些道具，如大幕、天幕、硬景片；演妇女用的假发，服装等则是向各处借用的。剧团人员一律尽义务，不拿工资。下乡演出吃饭，都是由当地的上绅、乡长等头面人物招待。小型道具由大家携带，所以用费极少。

二、剧团的演出情况：

剧目大多选择以抗日救亡为主要题材，如《放下你的鞭子》、《火海中的孤军》、《卢沟晓月》、《流亡三部曲》、《保卫家乡》等等。也演出一些田汉前期的作品如《南归》、《湖上悲剧》、《再见吧，南洋》等。《流亡三部曲》和《保卫家乡》这两个剧目则是演员们自行编创的，没有剧本。演出前，演员们在一起把故事的内容、情节熟悉一番。台词则由演员在台上根据剧情的发展随机创造应付。第一次演出是在城内的城隍庙，这夜看戏的人真是万头攒动，盛况空前。那时营山没有电灯，灯光是用两盏煤油灯代替。演出时，群众最受感动的是演员自己编创的《流亡三部曲》。内容大意是：东北三省沦陷，国土遭敌人蹂躏，有一农户，家人惨被鬼子杀害，房屋也被烧毁，剩下两母女流亡关内，无食无衣，靠卖唱和乞讨度日；时值严冬，大雪纷飞，母女俩蹒跚街头、饥唱且哭，歌词即“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首《流亡三部曲》，情景至为惨然，观者无不泪下。每演一次，观众中有送钱币，送物品到台上的，其效果可想而知。扮演母亲的为何礼学（现水电局退休干部），演女儿的为龙显贵（此人过早死亡）。那时营山风气落后，男女还不能同台演出，只有男扮女装。

剧团除在城内演出外，还先后分赴乡镇演出。首先去的是深堂乡、玉皇观；接着又去

骆市乡、小桥乡。那时演员和工作人员真辛苦，每去一地，都是步行。到达后白天演、晚上也演，没有一个人有怨言，想到为抗战出一份力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我记得，有一次去小桥乡演出，我们住宿在小桥小学，演出地点在一个庙宇里，两地相隔较远，演出完毕，已是深夜，所有的道具都要搬到住地。老教师唐问陶和刘鉴古两人主动抬一件行李。小桥街上又没有灯亮，黑夜中行走，实在困难，可是他两位坚持把行李搬回了住地。使我深受感动。

这年的寒假和春假我们都为演出而忙碌，真做到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为了抗日救亡，总算尽到了自己一点责任。

杨春薇 撰稿

邓托夫在营中二三事

邓托夫于一九三六年下期开始代理营山初级中学校长。那时，他年约二十六、七岁，经常穿一套芝麻呢旧西装，看上去就象一个高中学生。邓校长博学多才，性格爽朗，平易近人，工作积极热情，组织全校员工把学校办理得有条不紊，生气勃勃。他尤其注重对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十分关心学生的成长，深受学生和社会人士的拥护和爱戴。

一、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三十年代，营山只有一所中学，分为男生部和女生部（女生部设在考棚，现招待所内），教务处，训育处，事务处都设在男生部，女生部只住着三个班的学生（女四班不足十人，女五班、女六班各二十多人，总共不到七十人）和几位女老师。但邓校长从不忽视对女生部的领导，每一周都要用一定的时间到女生部，了解教学情况和学生思想动态，发现了问题就及时解决。如果有教师缺课，他就代课，不论代那一门课，都受学生的欢迎。

邓校长最反对学生读死书，反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更反对女同学读“嫁妆书”^①。在严格要求学生学好书本知识和坚持锻炼身体同时，还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扩大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他充分利用周会（系全校性的集会，每周星期日举行），和每天下午降旗的时

间，给学生讲国际国内大事。讲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种种罪行和我国人民所蒙受的耻辱，讲社会上弱肉强食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讲五四运动中京、津等地的爱国青年学生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走上街头，演说宣传，参加示威游行，讲前人攻读的榜样。还利用课余饭后的闲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有时向部分同学介绍一些陕北（延安）的情况，借进步书刊给一些同学阅读。他给很多同学送了照片，每一张的背后都写上勉励的话句：如“唯具果决与毅力者，方能成事业”，“头脑要象猴子那样灵敏，体魄要象雄狮那样强壮，意志要象骆驼那样坚韧不拔”“任重道远”等等。他平时很留意学生的言行，不轻易放过学生的过失。一次，他听到几个女同学唱黄色歌曲《桃花江》，抓住这件事，又是个别谈话，又是集体教育，从几千年来男女不平等的道理讲到国难当前，女学生应该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争取为女界中的强者。使全体女同学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他最反对男尊女卑，歧视妇女的封建传统观念。常常结合课堂教学和课余闲谈，鼓励女同学发愤读书。他说只有参加社会工作，求得经济独立，生活上不依赖谁，才不致受人歧视。还向一些女同学讲全国不少青年男女奔赴陕北的事。这些谆谆教诲，对提高稚气十足的女同学的觉醒，起了极大的启迪作用。

学校里还时常开展作文竞赛，歌咏比赛，球类比赛，排演新剧（又叫文明戏）和短足旅行等活动。那时，男女同学之间界线很严，就是亲戚或邻居都不敢交言，更不能同台演戏。为了开一开闭塞的风气，专门挑选一队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的男同学，在星期天周会结束后，同女同学比赛一场篮球或排球，男女同学接触多了，大家也就见惯不惊了。

在邓校长和老师们的循循善诱和熏陶下，同学们懂得了不少事理，绝大多数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学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按照三育（德、智、体）的要求，健康成长。

二、对学生坚持正面说服教育

学校对学生的管理相当严格，规定星期一到星期六，学生不得走出校门。要离开学校，必须先办请假手续，每一堂课和早晚都要清点人数。谁触犯了校规，都采取耐心教育。个别严重的，则记过。惩处学生一般由训育主任，董军教官或级任先生执行。女同学一般都能循规蹈矩，但有一些男同学却不那么安分，不时有人在归寝熄灯后，悄悄地溜出寝室，越过篱芭，跑到流二桥附近去打牌赌钱。有的甚至把自己的衣物都输掉了。这种事一旦被学校发现，就会受到不同寻常的处理。一天晚上，二年级的刘家玉跑出

去打牌，被邓校长发现了，刘认为这回碰上了校长，非同小可，心情格外紧张。第二天一直提心吊胆，好不容易挨到晚饭后，校长才找他谈话，而且根本不提打牌的事，只跟他拉家常。当刘谈到自己家住天池山区，靠父母务农维持全家生活时，不禁失声痛哭起来。随即自己去找了一根大竹板子，再三请求校长责罚，不然，他心里过不得。邓校长不打人，也不骂人，只是严肃的指出了一个青年学生，深夜跑出学校赌博的危害性。并对他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从此，刘家玉转变得很好，进步很快。这件事使好多老师和学生，都深受感动。认为耐心细致的正面说服教育，比简单粗暴的打骂，效果好得多，都佩服邓校长教学有方。

三、领导学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了芦沟桥事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邓校长立即组织师生办壁报，举行时事报告会，演新剧，大唱抗战歌曲。又把二、三年级成绩较好的男女学生编成宣传队。又搜集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和《流亡三部曲》等三十来首歌曲，石印出来，装订成册。封面上写着“悲壮歌声集”五个美术字，人手一册。人人会唱。邓校长还花了更多的心血，把“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加紧侵略我国，侵占领土、抢劫财物、杀人放火、侮辱妇女等滔天罪行，以及国家已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全国人民只有团结一致，奋起抗日，才能救亡图存等内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写成文章油印出来，发给宣传队的成员，作为宣传资料。起初，宣传队仅在县城的逢场天，在十字街口和茶馆、酒馆等群众聚集的地方进行宣传。后来，为了更广泛的提高群众抗日御侮的思想和抗战必胜的信心，邓校长又带领宣传队深入到回龙、东升、骆市、小桥、黄渡等乡区进行宣传。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群众很喜欢听宣传队唱歌和演说。不少的人，听了一遍，又跟着到另一个地方去再听一遍。每当听到敌占区同胞被屠杀、妇女受蹂躏的惨状时，就不住地掉眼泪。有些听众还情不自禁的跟着宣传的同学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等口号。那种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场面，是很激动人心的。

那时，营山没有公路，不论到哪里去，都靠步行。长途跋涉，对女同学，特别是生长在城市的女同学来说，确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刚出发时大家都兴高采烈，一路说说笑笑。走上十来里路，女同学说话的人少了，而且逐渐有人跟不上队伍了。邓校长最会鼓动“士气”，每当出现这种情况，立刻指挥大家唱几支歌，或猜几个谜语，或教读几句英语，

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疲劳也随之消除了，大家又精神饱满地继续前进。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不但教育了群众，而且使参加宣传的同学，心身都受到了很好的锻炼。

一九三七年下学期，邓校长因受地方恶势力排斥，被迫于当年年底离开了营山。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老同学聚会一堂时，谈起邓校长执掌营中那一段颇不平常的学生生活，大家仍记忆犹新哩。

龙明德 撰稿

注：①解放前有些富家女子在校读书不认真，只图混得一张毕业证书，借以抬高婚嫁地位，被讥为读“嫁妆书”。

我所知道的营山县长邓虎章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到营山县政府工作，任督缮室督缮员。当时的县长是罗江县人邓虎章，他任职期间，制定了如下一些规章制度。

一、县府的工作人员不准穿长衫、一律着短服。

二、联席办公。上至县长、科长，下至科员、雇员，都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工作。上下班以摇铃为准。上班时一律要在秘书办公桌前划到，过时收走划到簿，后来者不予注册，以此作为考勤的根据。

三、每天拂晓“天明炮”①一响，为起床时间。十分钟后，由县长亲自督率，全体职员到县府后面第二体育场集合，从事军事训练，进行全民抗战的预习，如因故缺席，必须事先请假。

四、每天早晨早操后七点钟升旗，下午下班后降旗。升降旗任何人不得无故不到。我记得有一个早晨天降小雨，县政府军法官许自强，升旗不到，邓县长当天就在黑板上公布了“军法官许自强升旗不到，罚洋二元”的处分。并在每月月终公布奖惩一次。

五、工作时间不准会客。如有急要事，必须先在传达室那里取得会客单，填写会客事由，经县长阅后，同意会才会。会客室桌上还立了一个牌子，上写：来宾注意，谈公不谈私，不得涉及讼事。

六、县城里的居民每家每户门上贴了一张“早睡早起”的纸条，规定早晨“天明炮”一

响，铺面就要开门；如有未及时开门的，警察就会敲门催促，要你起床。并规定在县城学生，每早晨由学校组织下晨操，锻炼身体。

除上述各项规章制度外，我记得县府大礼堂庭柱上还写了一付木刻对联，上联是：变政先变俗，下联是：革命先革心。白底蓝字，十分醒目。大堂上还挂着很多的木质匾额，分别写上“热心服务”“大公无私”“勇于负责”等字。对工作上表现出色的人，邓县长就送给他一张以资鼓励。那时对慈善事业搞得好的龚桂五、于树芝等人，都曾得过“热心服务”的木匾，挂在大门上或堂屋里以示表扬。

解放前国民党时期营山县历任县长中，要算这位邓县长是比较有政绩政声的人了。为了改善全城人民的饮水问题，他曾发动城镇居民疏浚北门河。北门河因系泥河，泥沙长年淤积，河床升高变窄，大雨后经常发生水患，邓县长除动员全城群众于每年冬季水落时，分段疏浚外，并亲自率领县府全体职工同群众一起，担任挖泥、抬石、排水的劳动。经过大家的努力，使北门河的饮水干净清冽，一改旧貌。他又发动全部公教人员和街道群众，将东、西、南各河饮水地段都一一加以整治。并会同当地土绅王鲁门，王松樵，唐怀清等将北门外的“垮拱桥”修好，以利人马通行。还在每年春秋两季号召全县公教人员植树，绿化营山。同时命令全城居民门前各植树一株，并要保证成活，死了就要罚款。当时在县府供职的人员多数都知道邓虎章是个作风正派，居行简朴，性格刚强，勤于职守的县长，许多年来，一直传为美谈。

注：①“天明炮”是当时县政府座请铁工铸造的一种下有铁盘，上有五寸长的铁筒，中装火药，下有火门的铁座炮。点燃后一声巨响，作为全城人民起床的信号。

徐 勋 撰写 文史组略有增删

我解放前经营山货业的经历

营山县的猪鬃洗毛业，是彭青山师傅开始的。彭是广安县人，有一套整制猪鬃的熟练技术。一九三六年，他被雇请到我县双河场帮人，培养了一批工人，如刘家银，彭世华、彭世云、周义全、刘世雄等，都成为后来的洗毛技术骨干。一九三八年，彭青山到县城帮人洗毛，因彭有吸大烟的嗜好，费用开支大，形成入不敷出，就悄悄偷卖好猪鬃，曾被人发